

文化资本的非均匀分布 中国城市居民的阅读情况

王绍光 黛博拉·戴维斯 边燕杰

像经济资本一样，文化资本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也不是随机的。而且，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差异与社会结构的其他特征相一致，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韦伯（Max Weber 1968, 1978）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但只有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作品发表

* 本文英文版正式发表于2006年7月出版的 *Modern China* 第32卷第3期（Volume 32 Number 3）。作者感谢 Hui Niu 在准备相关数据资料和 Yu Lee 在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方面提供的帮助。此项研究的一个比较早的版本曾经在香港大学召开的题为“重新确定上海和香港在现代中国史中的位置”的研讨会上宣读。文章所有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美中合作研究项目（United States-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本论文另外一个稍早一些版本的中文版曾在赵汀阳先生主编的《年度学术2004——社会格式》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中刊出（译者为陆丁先生），但此次在《比较》刊出的是根据在 *Modern China* 的正式发表稿翻译的。与前稿相比，最终发表稿重点更突出，多幅图表不一样，理论框架和论文结构更紧凑。——作者注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学术期刊 *China Review* 主编。目前主要从事有关中国国家制度建设（state rebuilding in China）的研究。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边燕杰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主任。目前他主要研究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作用。本文参考文献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 bijiao@citicpub.com。——编者注

之后，学者们才开始全面转向，从原先的主要从内在美学价值的角度来研究文化，转而研究文化对阶层从属和支配的“象征性权力”。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选择是由高到低垂直排列的。因此，文化品位上的差异，诸如服饰、娱乐、音乐和阅读的偏好等等一些看似寻常的细节，能够显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且也能够维持、强化和复制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Bourdieu 1984,1985）。并非每一个在布尔迪厄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认同这种文化选择的单一排列秩序，或者都找到了社会地位与文化选择之间的显著联系，但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对文化资源消费的研究，是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DiMaggio 1982, 1991, 1994; DiMaggio 和 Ostrower 1990; Ganzeboom 和 Kraaykamp 1992; Katz-Gerro 1999; Katz-Gerro 和 Shavit 1998; Lamont 和 Fournier 1992; Sobel 1983; Wilson 1980）。

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的作用。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研究的空白，本文运用一次对上海、深圳、天津和武汉四个城市 400 对夫妻的阅读习惯的调查所得的数据，来探讨在中国城市快速变化的混合经济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互作用。运用这些数据，我们考虑回答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文化资本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是如何分配的？在当代中国社会，非经济资本在产生和保持社会不平等的格局方面的作用如何？

本文将首先评述文化资本的不同定义和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文化资本差异的相关解释。然后，运用阅读偏好作为文化资本的指标，我们将概述在作为调查样本的 800 个城市居民中，不同阶层的个人所选择的作品种类和喜欢的作家的不同。我们认为，按阶层区分的阅读习惯，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中文化资本的作用。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

我们的理论起点是布尔迪厄的多重资本分析框架。在布尔迪厄（1984）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收入和所有权所决定的等级体系。相反，它是一个混沌的“社会空间”，在其中多种形式的资本从纵向和横向界定特定的社会位置。尽管社会中任何有价值的资产、资源或物品都能算作是一种资本（Bourdieu 1985），在其分析案例《区隔》（*Distinction*）一书中，布尔迪厄主要着眼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举例说，在法国，技术人员和工

商业雇主构成了社会空间中的特定阶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经济资本，而且还因为他们有着独特的消费倾向，独特的文化品位，以及在更普遍的意义而言，他们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Bourdieu 1984）。

在布尔迪厄的模型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人的文化品位中。最高阶层的文化被看作是最高贵的文化。统治阶层（或者这一阶层中的某些人）可以用他们独特的文化品位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或作为保持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优势地位的一种手段。文化品位在这里是作为在社会集团中做出区分的一种排斥性的设计，也作为促进阶层内部团结（或者精英联合）的一种方式。布尔迪厄还假定，对于特定的音乐、艺术作品或作者的偏好能够显示文化品位的高下，这些偏好系统地勾画出了职业阶层的排名（Bourdieu 1984，第17、271、361页）。

相反，美国社会学家彼得森（Richard A. Peterson）质疑这种职业等级结构与文化等级结构严格一一对应的普适性（Peterson 1992；Peterson 和 Kern 1996；Peterson 和 Simkus 1992）。比如，彼得森在对休闲活动和音乐偏好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社会地位高的人，比起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来说，无论是其观赏的文艺作品，还是参与的消闲活动，其种类都要丰富得多。事实上，“上层人士比下层百姓更喜欢大众化的音乐和艺术作品。”因此，在彼得森的论述中（1992），上层人士并不只欣赏“阳春白雪”，而是文化的“杂食者”；下层百姓也不是“下里巴人”，而是文化的“专食者”。下层百姓往往只喜欢某一类型的文化；而且对于与他们的社会阶层、生活地域、种族、民族和宗教不相关的知识，他们知之甚少。由于具备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上层人士在不同场合，比如处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或建立社会关系网以帮助得到工作或做好工作等方面，往往游刃有余（DiMaggio、Evans 和 Bryson 1996；DiMaggio 和 Mohr 1985）。“杂食者”之所以不同于“专食者”，并不在于其文化品位的不同，而在于是否熟知多样化的文化类型（Erickson 1996）。

因此，文化资本可能会有两种存在形式：独特的文化品位（Bourdieu）或者独特的文化储备（Peterson）。在我们的课题中，我们一开始不预设哪一种立场，但我们将提出方法来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有效性。

阅读的重要性

在这项探索性的研究中，我们只关注一项文化活动——闲暇时间的阅读。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可阅读是显示文化差异和社会分层的一项强指标（Bourdieu 1984；

Erickson 1996; Kraaykamp 和 Dijkstrab 1999; Kraaykamp 和 Nieuwbeerta 2000; Stokmans 1999; Tepper 2000; Van Rees、Vermunt 和 Verboord 1999)。而且，对于衡量中国城市居民差异化的文化类型而言，阅读习惯也是一项特别好的尺度。

首先，诸如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欣赏戏剧等文化活动，只是一定地区或者一定收入水平的居民才有机会享受；而因书店和图书馆的普及，阅读相对而言是一件更普遍的事情。的确，我们的调查发现，阅读是所有四个城市的受访者最为普遍的休闲活动之一，其普及程度仅次于看电视。因此，对阅读展开调查，回收率会比较高，而且误差很小。其次，阅读和工作是分开的。在工作中，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但在闲暇时间，他们的行为是自由的，从而也能够更好地显示出他们真正的偏好。第三，阅读是一项个性化的活动。看电视时，选择看什么节目通常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而看书时，选择什么书往往视个人自己的偏好而定。第四，书籍种类的多样性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因此，阅读基本上可以反映文化品位的差异：一个人对图书的选择，大体上可以作为个人文化偏好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基于以上理由，对于阅读习惯的研究，不仅可以衡量文化资本的分布，而且可以用我们的数据与有关文化偏好和社会阶层的更多的比较文献直接对话^①。

阶层和文化资本

无论是仅仅由收入水平来定义，还是由对财产、劳动以及知识的占有所决定的多维位置来作更详细的定义(Wright 1985,1997)，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中，阶层是进行社会经济区分的一个主要尺度。最初，阶层与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仅仅表现为间接相关，但社会学家们已经将文化品位和文化偏好置于他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核心(Veblen[1899]1953; Weber[1968]1978)，当代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文化定位与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复制之间的动态联系(DiMaggio 和 Useem 1978; DiMaggio 1982; Erickson 1996; Gans 1974; Hall 1992; Halle 1993; Milner 1999)。比如说，吉登斯的阶层结构理论认为，经济关系能够转化为“非经济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的文化定位(Giddens 1973,第105页)。

布尔迪厄明确地把文化偏好和文化消费视为阶层地位的组成部分，因为一个阶层可能会有着与其他阶层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无论这些生活条件和生

^① 尽管阅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该领域有关社会差异的实证研究却付诸阙如。唯一的例外是康晓光等人在1988年所作的研究。

活经历在个体的层面上如何多样化，它们都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阶层习性”，或者说是一个特定阶层的成员（部分地）共同拥有的一个“持续的、可对调的意向的系统”（Bourdieu 1977，第72页）。因此，对于布尔迪厄和那些基于他的工作来开展研究的学者来说，阶层就是文化偏好主要的决定因素（Breen 和 Rottman 1995；Scott 1996）。反过来，文化行为不仅充当了“阶层的标志”（Bourdieu 1984，第2页），而且它们也在创造、认可和复制阶层的区隔。

布尔迪厄的批评者们质疑：在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截了当的联系？北美的许多学者并不认为阶层和文化品位是几乎一一对应的，相反，他们的研究已经证实，人们的文化品位与他们所在的阶层并不一致（Lamont 1992；Peterson 1992；Peterson 和 Simkus 1992）。比如说，彼得森对文化选择的类型所作的分析表明，美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并没有形成排他性的文化品位。不过，通过区分“杂食者”和“专食者”，彼得森实际上还是回到了以阶层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只不过他用“杂食者”和“专食者”的划分，取代了布尔迪厄的高雅和低俗的划分。一般而言，上层人士总是比下层百姓熟悉更多的文化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阶层还是相关的。

布尔迪厄理论的其他批评者强调，对一个社会中文化差异的解释，不应该单单强调阶层差异。比如说，区域亚文化就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DiMaggio 和 Peterson 1975；Gastil 1975）。通过正常的社会化通路，在特定区域内的这种文化特征将很可能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而与阶层结构的影响无关（Hebdige 1979；Lamont、Schmalzbauer 等 1996；Marsden 和 Reed 1983；Marsden、Reed 等 1982）。

个体层面上的人口统计学因素也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而这同样与阶层无关。这些因素在人的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也会变化（Belloni 1996；Collins 1992；Erickson 1996；Lamont 和 Lareau 1988；Shaw 1994）。比如，布尔迪厄一直忽略了性别差异因素，而如果在解释中考虑这一因素的话，就与只关注阶层的解释不一致，尽管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不同（Bihagen 和 Katz-Gerro 2000；Netz 1996；Tepper 2000）。有的研究者认为，比起男性来，女性较少接触到高雅文化（Green 等 1990；Samuel 1996），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结论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到高雅文化中来（Bryson 1996；DiMaggio 1982）。

同样，年龄和出生年代也会影响文化消费。一方面，随着年纪的增加，对于文化类型而言，人们知识的广度会不断增加（年龄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一代人会有他们这代人独特的文化偏好（代际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经常注

意到所谓“代沟”的原因之一。这两类影响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统计上很难把两者区分开。不过，就像性别一样，年龄差异也不能被忽略。而在我们的分析中，在评估阶层因素的影响时，我们明确地控制了年龄因素。

受正规教育年限的长短同样决定着文化差异，而这也与职业阶层无关。教育不仅使人能够积累文化知识，而且能够强化美学鉴赏水平。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比其他人参与更多的高雅文化活动，而且也拥有更大的文化储备（Gans 1974）。大量的实证研究一再表明，教育是人的文化偏好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Bennett、Emmison 和 Frow 1999）。

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这几个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因素是如何与社会阶层的位置相互作用，从而系统地塑造了不同职业的男性与女性人群的阅读习惯与品位的。

二、数据及其衡量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有关阅读习惯的数据，来自于作者在上海、深圳、天津和武汉所进行的长达一年的调研。我们从各个城市的户籍登记资料中随机抽取了 400 个家庭的初始样本，并在 1998 年 1 月 ~ 1999 年 1 月之间对每个家庭进行了四次访问。因为此次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与政府官员、蓝领工人和个体户相比，工商业经营管理者的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我们最初重点抽查了由担任工商业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男性任家长的家庭。

在每个城市，我们都随机抽取 20 户户主为工商企业部门主管以上管理者的家庭，20 户户主为国有机构或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20 户户主为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20 户户主为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家庭，以及 20 户户主为私人企业主的家庭^①。

接下来，基于我们对受访者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的更多细致的了解，根据他们目前的工作状况，我们把所有受访者归入由职业所限定的八个社会阶层：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服务业工人、产业工人、私人企业主，以及个体户。有关阅读习惯的数据是在 1998 年 9 月调查搜集的，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在当年 1 月和 5 月所作的重点关注教育、家庭和经济情况的访谈

^① 不过，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户籍登记的调整远远赶不上工作流动的速度，此次调查所得到的职业分布与我们原先设计的并不相同。

所搜集到的材料联系起来。根据这八个社会阶层的划分,我们来描述在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和职业群体中阅读习惯的不同,进而全面探究文化资本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联系。

文化及文学知识与品位的指标

为了衡量受访者的文化及文学知识与品位,我们在调查中首先直接提问他们阅读22类文学和非文学书籍的经常程度,然后按照一个列出20个中外作家的单子,要他们回答喜欢某一个作家的程度^①。对于书籍偏好问题答案的打分为:回答“从不阅读”得0分,“偶尔阅读”得1分,“有时阅读”得2分,“经常阅读”得3分。而对于文学家喜爱程度问题答案的打分为:“没有听说过”得0分,“知道名字但没有读过其作品”得1分,“读过其作品但不喜欢”得2分,“读过但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得3分,“读过而且很喜欢”得4分。

为了了解一个受访者的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的广度,我们统计了他读过的图书种类。因为我们所列出的图书类别涵盖了阅读兴趣的方方面面,这一变量可以检验彼得森的如下观点:相较于下层百姓,上层人士的休闲活动更为多样化,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偏好也更广泛。更具体地说,我们假定:一个受访者所读过的图书种类越多,她/他所获得和掌握的文化知识就越广。

上文提到的八个职业阶层对于图书种类的偏好的分布如表1所示。正如表中的算术平均值所反映的,大多数的图书种类只吸引一小部分的读者。只有两类图书(专业技术技能和时事政治)的分值高于1.40,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有时或经常)阅读过那一种的图书。最受欢迎的图书种类包括专业技术技能(1.43)、时事政治(1.43)、实用生活知识(1.32)、有关子女教育的书(1.30)、人物传记(1.25)以及纪实文学(1.24),而读者群最少的图书种类则包括宗教读物(0.31)、科幻小说(0.52)和有关股票的书(0.58)。在我们随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中,我们还将详细阐述这一变量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

为了了解受访者的文学知识,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她/他阅读所喜欢的图书种类的经常程度,而且也需要了解她/他对于作品的熟悉程度和对作者的喜爱程度。因此,在提问有关20个中外著名作家的问题时,我们同时问被访者阅读这些作家作品的经历以及对这些作家的喜欢程度。表2列出了有关每一个作家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① 这20位作家在表2和表4中列出,而在附录中则给出了他们的简介,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作家的作品所代表的特定文化内涵。

最受欢迎作家的前三名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3.01)，被毛泽东 (1965, 第372页) 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 (2.79)，以及宋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苏东坡 (2.67)。而喜欢人数最少的三个作家则是王小波 (1.10)、苏童 (1.38) 和王安忆 (1.44)，他们都是现代作家。

表 1 不同职业阶层对图书种类的偏好 (平均值)

图书类别	党政干部	企业管理者	专业技术人员	办公室职员	服务业工人	产业工人	私人企业主	个体户	平均
专业技术技能	134	1.78	2.03	1.39	0.82	1.04	1.90	0.89	1.43
时事政治	2.11	1.66	1.73	1.64	1.04	1.08	1.30	0.68	1.43
实用生活知识	1.59	1.15	1.56	1.67	1.11	1.05	1.50	0.98	1.32
有关子女教育的书	1.32	1.10	1.46	1.73	0.99	1.20	0.90	1.14	1.30
人物传记	1.66	1.56	1.49	1.34	0.88	0.91	1.50	0.79	1.25
纪实文学	1.89	1.39	1.51	1.33	0.86	1.02	1.10	0.62	1.24
有关改革的书	1.98	1.49	1.34	1.34	0.66	0.74	1.10	0.45	1.12
教材/辅导书	1.32	1.01	1.59	1.26	0.77	0.80	0.80	0.66	1.11
中外文学名著	1.59	1.26	1.39	1.26	0.78	0.79	0.60	0.34	1.08
人生修养	1.41	0.96	1.24	1.17	0.79	0.69	1.20	0.30	0.97
经营管理	1.18	1.77	0.87	0.92	0.55	0.40	2.00	0.52	0.87
言情小说	0.73	0.59	0.82	1.11	0.79	0.73	1.10	0.73	0.80
侦探小说	0.75	0.77	0.78	0.91	0.67	0.72	1.00	0.64	0.76
历史/地理	1.07	0.71	0.91	0.91	0.62	0.55	0.50	0.45	0.75
中外关系的书	1.36	0.90	0.94	0.90	0.50	0.46	0.50	0.27	0.75
哲学/学术著作	1.36	0.90	1.00	0.82	0.48	0.27	0.40	0.16	0.71
诗歌/散文	1.14	0.79	0.94	0.90	0.49	0.38	0.20	0.41	0.71
武侠小说	0.80	0.63	0.58	0.62	0.67	0.69	1.00	0.79	0.66
体育/游戏	0.93	0.87	0.67	0.72	0.48	0.57	0.60	0.34	0.64
有关股票的书	0.65	0.66	0.58	0.75	0.52	0.54	0.20	0.36	0.58
科幻小说	0.64	0.56	0.61	0.64	0.45	0.39	0.70	0.23	0.52
宗教读物	0.53	0.32	0.36	0.47	0.28	0.15	0.50	0.02	0.31
平均	1.24	1.04	1.11	1.08	0.69	0.69	0.94	0.54	

提示问题：“你经常读以下类别的图书吗？”

受访者的文化/文学知识的广度可以由他所阅读的图书种类以及作家的数量来衡量，而他的文化/文学品位则通过因子分析技术来衡量，这种技术有助于确定不同受访者的品位。当然，研究者可以设计出一种主观分类来区隔人们的品位，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并不能准确反映受访者已经培养起的阅读品位。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要运用因子分析技术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潜在的品位分类(或者叫因子分析法中的“潜因子”)。对于检验布尔迪厄有关上层人士比下层百姓更喜欢高雅文化的论断而言,这种方法特别有用。

表2 不同职业阶层对特定作家的偏好(平均值)

作家	党政干部	企业管理者	专业技术人员	办公室职员	服务业工人	产业工人	私人企业主	个体户	平均
曹雪芹	3.39	2.94	3.25	3.09	2.92	2.80	2.30	2.63	3.01
鲁迅	3.25	2.85	2.87	2.79	2.68	2.71	2.80	2.46	2.79
苏东坡	3.52	2.95	2.91	2.44	2.37	2.35	3.40	2.27	2.67
巴金	3.30	2.49	2.80	2.56	2.38	2.46	2.60	2.30	2.60
高尔基	2.91	2.62	2.77	2.54	2.44	2.36	2.50	2.29	2.57
琼瑶	2.02	2.36	2.54	2.60	2.55	2.65	2.60	2.39	2.50
金庸	2.89	2.30	2.26	2.33	2.12	2.44	2.10	1.84	2.29
三毛	2.57	2.30	2.65	2.43	2.02	1.97	2.80	1.73	2.29
杨沫	2.95	2.06	2.52	2.13	1.92	1.64	0.60	1.13	2.05
张爱玲	2.35	2.34	2.24	2.16	1.61	1.29	2.00	1.21	1.91
王朔	2.59	2.46	2.09	1.77	1.33	1.48	0.90	1.13	1.81
莫泊桑	2.68	1.95	2.23	1.74	1.40	1.39	1.40	1.04	1.78
钱钟书	2.23	2.14	2.17	1.84	1.46	1.32	0.50	0.84	1.74
冯骥才	1.84	2.35	2.03	1.78	1.31	1.27	1.60	0.89	1.69
马克·吐温	2.27	1.81	2.01	1.57	1.15	1.30	1.60	1.18	1.62
贾平凹	2.14	1.79	1.78	1.63	1.11	1.18	1.00	0.77	1.49
梁晓声	2.52	1.96	1.85	1.48	0.98	1.02	0.70	0.89	1.49
王安忆	2.14	1.95	1.71	1.56	0.90	1.17	1.40	0.57	1.44
苏童	2.11	1.76	1.69	1.58	0.96	0.82	1.50	0.82	1.38
王小波	1.51	1.47	1.37	1.17	0.89	0.72	1.20	0.48	1.10
平均	2.56	2.24	2.29	2.06	1.73	1.72	1.78	1.44	

提示问题:“你喜欢阅读下列作家的作品吗?”

解释性变量

阶层(class):基于社会学家赖特(Erik O. Wright)对于阶层权力和地位的多方面特征所作的研究,根据他们自己的职业描述(包括资产的所有权、劳动技能和工作场合的自主性),我们把受访者重新划分为8个阶层。在这里,我们运用了赖特的阶层分析方法,而不仅仅只根据收入水平来划分,这是因为关注人们在统治和剥削的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于改革以来的中国而言特别有针对性。这8个阶层包括了两个控制财产的阶层(私人企业主和个体户)以及两个控制了组织

机构的阶层（企业经营者和党政干部）。考虑到掌握某种技能的人占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且具有不同特征，我们把其余的人分为四类：专业技术人员、白领办公室职员、蓝领产业工人，以及服务业工人^①。

1. **服务业工人**：不熟练或半熟练的雇员，直接提供服务，包括售货员、修理工、厨师、保安和司机等。

2. **产业工人**：蓝领体力劳动者，直接参与生产。

3. **个体户**：服务业或制造业的自我雇用者，不雇用其他人，只有很少的资产^②。

4. **私人企业主**：他们也是自我雇佣者，但他们还雇用其他人，而且拥有比较多的资产。

5. **办公室职员**：办公室员工，从事日常的白领工作。

6. **专业技术人员**：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专业教育，从事非常规的白领工作，但不包括部门主管以上的管理人员。

7. **企业经营者**：在工业企业或其他的营利性企业中，担任部门主管以上职务的管理人员。

8. **党政干部**：在党政机关中担任科长以上职务的管理人员。

在我们所做的回归分析中，服务业工人是遗漏/参考项。

城市哑变量：为了了解当代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我们的调查选择了两个1998年时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均在全国领先的城市——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和长江入海口旁的大城市上海，另外也选择了两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华北的天津和中南地区的武汉。武汉是遗漏/参考城市。

性别：为了研究性别差异，我们把女性作为参考项，来与男性相对照进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社会学课题组最近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来对中国城市和农村新出现的（或重新出现的）阶层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尽管该课题组没有明确说明他们的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但看起来这个报告综合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韦伯的自治理论和布尔迪厄的习性理论（陆学艺等 2002，第7~10页）。按照这个研究报告，中国目前有10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很显然，这一报告与我们的研究分类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的。

② 中国的个体户与西方社会里的“自我雇佣者”（self-employed）在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自我雇佣者”包括医生、律师、心理医生和其他私人执业者。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区别。

研究。

教育：我们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受访者的教育水平。

年龄：在此项研究中，我们以年为单位衡量受访者的年龄。

三、研究发现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评述阅读习惯中所反映出来的阶层差异，然后解释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用因子分析法来构建我们的核心因变量——品位簇（taste clusters）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容。最后，在剔除了地区、性别、教育和年龄的影响之后，我们将分析文化知识和品位（以对图书种类的偏好来衡量）和文学知识和品位（以对文学作家的偏好来衡量）的差异与职业阶层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阅读习惯的阶层差异之双变量分析

表1和表2清晰地展示了阅读习惯的阶层差异。无论是对图书种类的偏好还是对文学作家的偏好，平均值在这八个阶层中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两张表揭示了阶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鸿沟^①。

如表1所示，个体户在读书方面最不积极。这一阶层对所有图书种类的平均值（0.54）表明，这一阶层中有将近一半的人从来不读所列出的任何图书种类中的任何内容。事实上，个体户的阅读排名，22类图书中除了武侠小说、经营管理、言情小说、专业技术技能、诗歌/散文、有关股票的书和有关子女教育的书以外，其余15类都排在八个阶层中的倒数第一。

相反，党政干部则是最热心的读书人。他们的总平均分（1.24）表明，平均而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读了任何一类图书中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在大多数种类的图书中，他们的阅读排名都遥遥领先于其他阶层。但与企业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起来，党政干部对于下列种类的图书相对缺少兴趣，也没那么积极：经营管理、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实用生活知识、专业技术技能、教材/辅导书、有关股票的书、有关子女教育的书。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区别也非常显著。

就平均值而言，党政干部、企业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的阅读平均值都超过了1，而个体户、服务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的阅读平均值都没有

^① 双变量分析是指对两个变量的分析，其目的是确定这两个变量是否相互关联。交互表列分析经常用于直观地反映双变量之间的潜在的关系。

超过0.69。此外，私人企业主的阅读行为同样令人吃惊：在阅读经营管理类图书、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方面，他们都排在第一。

而当考虑对作家的熟悉和喜欢程度时，阶层之间的差异更加令人吃惊（见表2）。党政干部的表现再次突出，拥有最高的文化资本，而蓝领工人和个体户则排名垫底。在这张表上我们能够发现，除了3个作家（琼瑶、三毛和冯骥才）外，对其他所有作家的熟悉程度，党政干部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阶层。而对于台湾言情小说作家三毛的熟悉程度，党政干部落在了个体户的后面。私人企业主对于作家的熟悉程度也表现得非常不平衡，有的时候超过了企业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对苏东坡和三毛），而有的时候又落在了产业工人的后面（比如对曹雪芹、金庸、杨沫、王朔和钱钟书）。

用表1和表2所进行的双变量分析尽管比较简便，但还不足以证明阶层与文化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因为在这两个表格列出了太多的图书种类和作家。为了明确阅读习惯的类型，我们首先需要设计出一些更加可控的品位簇（Marsden和Swingle 1994）。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将进行受访者图书种类偏好和作家偏好的独立因子分析。进而，因为双变量分析中的阶层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些阶层中的受访者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差异所引起的，所以我们需要开发超越这八个阶层的模型。为了检验在排除其他可能性之后阶层之间显著的差异是否还继续存在，我们需要运用多元回归技术，来估计在不受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阶层差异对阅读习惯的影响。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在保持受访者的教育、年龄、性别和所居住的城市等变量恒定不变时，回归能够使我们精确衡量阶层的重要性。

阅读品位簇的因子分析

在表3中我们看到，22类图书的阅读偏好形成了4个明确的因子，来表示受访者的阅读品位^①。第一个因子由11类图书组成，它们有的具有美学特征（比如中外文学名著、诗歌），有的提供智识（比如哲学/学术著作、宗教的书、关于改革的书、人生修养、中外关系的书），有的具有明显的纪实和史料价值（比如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历史/地理，以及时事政治）。而四类通俗小说（包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则构成了第二个因子。第三个因子包含企业经营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五类图书（包括有关股票投资、经营管理、改革、

^① 因子分析是一种统计技术，它可以将需要研究的变量浓缩为更少的支持因子或称“潜”因子。在此项研究中，当我们运用斜交旋转技术来检测两组变量的潜因子结构是否正交时，我们发现，在两方面，因子相关性都大于0.32。因此，这里的因子分析是用Oblimin旋转实现的。

中外关系的书, 以及体育/游戏)。而第四个因子则由与家庭生活高度相关的五类图书组成(包括教材/辅导书、有关子女教育的书、实用生活知识、言情小说和专业技术技能)。

表3 图书类型的旋转因子负载

图书类型	高雅	通俗小说	与经营管理相关	与家庭生活相关
宗教图书	0.718	0.149	-0.064	-0.307
纪实文学	0.698	0.013	-0.107	0.231
中外文学名著	0.661	0.113	-0.204	0.213
人物传记	0.617	0.030	-0.009	0.242
哲学/学术著作	0.617	-0.025	0.138	0.086
人生修养	0.606	0.000	-0.016	0.347
历史/地理	0.596	0.085	0.181	0.039
时事政治	0.577	-0.053	0.346	0.163
有关改革的书	0.529	-0.046	0.440	0.092
中外关系的书	0.512	0.034	0.415	0.110
诗歌	0.501	0.010	-0.060	0.387
武侠小说	-0.078	0.840	0.108	-0.105
侦探小说	0.151	0.771	0.115	0.028
言情小说	-0.048	0.596	-0.339	0.426
科幻小说	0.344	0.526	0.140	-0.008
有关股票的书	-0.227	0.144	0.693	0.131
经营管理	0.272	-0.027	0.568	0.127
体育/游戏	0.305	0.251	0.430	-0.030
教材/辅导书	0.113	0.044	0.045	0.710
有关子女教育的书	0.057	0.176	0.122	0.633
实用生活知识	0.190	0.016	0.219	0.527
专业技术技能	0.187	-0.141	0.280	0.520
特征值	8.870	1.746	1.251	1.052
累积解释方差 (%)	40.318	48.255	53.941	58.721

注: 因子提取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旋转方法是 Kaiser 标准化的 Oblimin 旋转。

换言之, 尽管人们可能对不同种类的图书感兴趣, 他们的偏好一般会属于上述四个因子所代表的四个大类别中的某一类。总体而言, 这四个因子有着很高的累积解释方差(58.7%), 而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特征值都高于临界值1。这样的统计估计就确保了我们所确定的因子是四个城市的居民阅读品位的可靠变量。

类似地, 当我们试图探究受访者作家偏好的潜在因素时, 也同样产生了四个

因子，能够解释这些项目的总方差的 55.4%（参见表 4）。这四个因子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乃至超过了我们原来设计问卷时的预期。第一个因子包括七个当代小说家（钱钟书、王安忆、贾平凹、王朔、苏童、王小波和梁晓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尽管钱钟书早在 1947 年就发表了他的知名小说《围城》，但在 1949 年之后，直到 1980 年《围城》重印之前，他的名字一直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因此，把钱钟书列入这一大类中，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学术界通常假定对当代作家的偏好代表着更高的文化品位。有意思的是，如表 2 所示，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之间对于这七个作家的（偏好）平均值的差异，要比对其他作家（的偏好差异）大得多。

表 4 作家的旋转因子负载

作家	当代	红色经典	言情	经典
苏童	0.867	-0.046	0.099	0.114
王小波	0.855	-0.064	0.150	0.224
王安忆	0.618	0.054	-0.009	-0.098
梁晓声	0.600	0.017	-0.077	-0.229
王朔	0.557	0.208	-0.135	-0.174
贾平凹	0.550	0.012	-0.056	-0.309
钱钟书	0.547	0.208	-0.132	-0.157
巴金	0.094	0.810	0.022	0.158
鲁迅	-0.019	0.755	0.068	0.057
高尔基	-0.113	0.697	0.022	-0.203
曹雪芹	-0.012	0.591	0.264	-0.144
杨沫	0.351	0.588	-0.158	-0.019
琼瑶	-0.041	0.236	0.710	0.142
三毛	0.163	0.028	0.616	-0.287
马克·吐温	0.121	0.085	-0.083	-0.723
莫泊桑	0.091	0.238	-0.205	-0.638
金庸	-0.001	-0.063	0.145	-0.570
苏东坡	-0.005	0.399	0.186	-0.448
张爱玲	0.359	-0.138	0.389	-0.381
冯骥才	0.300	0.225	-0.049	-0.244
特征值	6.841	1.942	1.232	1.056
累积解释方差 (%)	34.203	43.911	50.072	55.352

注：因子提取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是 Kaiser 标准化的 Oblimin 旋转。表格中的黑体表示属于该列所标出的作家作品类型。

第二个因子由五个作家组成，他们是：巴金、鲁迅、杨沫、高尔基、曹雪芹。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的作品曾经被政府大力推荐。他们有些作品还被选入了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第三个因子仅仅包括两个来自台湾的流行言情小说女作家，琼瑶和三毛。第四个因子包括了四个其作品被普遍赞誉为经典名著的作家。莫泊桑、马克·吐温和苏东坡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经典名著。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可看作经典，因为他的作品不仅吸引社会大众，而且也受到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的青睐。金庸的作品将故事置于一个精心考虑过的历史背景中，而且文字非常优雅，所以其文学价值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事实上，“金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文化探索的新领域。另外两个作家，冯骥才和张爱玲，没有被放在任何一个因子中。也许他们的作品适合于不止一类读者的喜好。

文化品位研究的一个通常做法是主观认定某一作品是高雅的，一般的，还是低俗的 (Bourdieu 1990; Levine 1988; Rubin 1992)。我们的方法则有所不同。我们没有依赖于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是从受访者对具体图书种类和具体作家的偏好中找到了阅读品位的标准。这个方法能够使我们超越惯常的高雅/低俗划分。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文化品位并不构成从高价值到低价值的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 (DiMaggio 1987)。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运用这个方法，可以用来研究成功机会和途径都在不断多样化的中国城市 (Davis、Bian 和 Wang 2005)。

回归分析

在将42个独立的阅读偏好缩减为8类品位簇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回答：在排除干扰变量的情况下，阅读品位与职业阶层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因变量与上文提到的所有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①。表5给出了有关受访者对于不同的图书种类的知识 and 品位的五个多变量回归模型的结果，而表6则给出了有关受访者对于具体的作家的知识和品位的另外五个多变量回归模型的结果。为了比较职业阶层与模型中涉及的其他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的不同强度，两个表格都给出了消除衡量单位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②。

① 多元回归是一种统计技术，是在保持模型中涉及的其他所有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估计因(结果)变量与每一个自(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方向以及数量大小。

② 另外一种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则运用最初的衡量单位，这样就不可能比较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相对程度。

文化知识和品位的决定因素

像布尔迪厄和彼得森一样，无论我们检验图书种类的知识还是图书种类的品位，我们都找到了阶层对于阅读习惯的强烈影响。在表5中，运用第1列（图书种类阅读量）和第2列（高雅作品）所提供的回归估计值，我们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分别检测了彼得森和布尔迪厄的阶层影响假说。那些在工作场所拥有自主权的人（党政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士、办公室职员不仅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经常阅读高雅图书（第2列），而且还比其他阶层的人阅读更广泛的图书种类（第1列）。而个体户所读的高雅著作，则比其他阶层的人少得多（第2列）。应当谨记的是，只有在统计意义上控制个人特征和城际差异的情况下，才能估计出阶层的影响效应。就是说，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在性别、年龄、教育等特征也都一致的中国城市居民，很可能有着不同的阅读范围和不同的阅读偏好，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职业阶层。这意味着就权力、技能或财产的掌握的角度而言，阶层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的差异。

而就家庭类图书（第3列）、管理类图书（第4列）和通俗小说（第5列）而言，阶层差异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紧密。但是这样的结果的确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的阅读选择超越了高雅—低俗的两分法。学术界普遍假定所有的中国人都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和谐，我们的研究却发现，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和产业工人阅读的家庭类图书比其他阶层的人要多很多。有意思的是，尽管党政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所阅读的图书种类和高雅图书数量都要比其他阶层的人多，但他们并没有读过比较多的家庭类图书。可能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吧，企业经营管理者，而非党政干部，对于阅读管理类图书特别有兴趣。最后，在阅读通俗小说方面，阶层几乎没有造就任何差异。除了办公室职员比其他阶层的人更爱读小说外，小说在社会各阶层中间都同样流行。

或许，表5中最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就图书种类的知识 and 品位而言，两个新兴的有产阶层（私人企业主和个体户）更类似于劳工阶层（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而不是掌握机构资产或拥有专业技术/学历的其他阶层。现在还无法预言，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这种文化资本的特殊类型将不会持续；手工劳作和小零售店还会不会是迈向更高收入和资本所有权的晋身之阶。

模型中的其他变量也为想要更多了解中国城市的研究者提供了很有意思的视角。男性和女性有着不一样的阅读品位。相较于女性，中国的男性阅读范围更广（第1列），读更多高雅图书和经营管理类图书（第2列、第4列），但所读的家

庭类图书则比较少(第3列)。不过,在阅读通俗小说方面没有什么性别差异(第5列)。简而言之,中国的男性喜欢读有关高雅文化和职业发展目标的图书,而女性则更多地关注家庭类图书。

表5 图书类型选择的阶层和其他因素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预测元变量	因变量				
	总的图书类型	高雅	家庭生活类	经营管理类	通俗小说
阶层(服务业工人=0)					
党政干部	0.128***	0.16***	0.028	0.068	0.045
企业经营管理者	0.125***	0.097**	0.048	0.187***	0.008
专业技术人员	0.196***	0.13**	0.228***	0.094	0.061
办公室职员	0.149***	0.098**	0.151***	0.065	0.099***
产业工人	0.03	-0.029	0.086***	0.015	0.046
私人企业主	0.045	0.025	0.027	0.036	0.043
个体户	-0.037	-0.091**	0.058	-0.013	-0.019
个人特征					
性别(女性=0)	0.069**	0.06*	-0.122***	0.261***	0.051
年龄	-0.126***	-0.011	-0.169***	-0.017	-0.241***
受教育年限	0.309***	0.308***	0.335***	0.062	-0.042
城市哑变量(武汉=0)					
上海	-0.341***	-0.265***	-0.282***	-0.297***	-0.074
天津	-0.092**	-0.045	-0.078*	-0.14***	-0.001
深圳	0.03	-0.012	0.009	0.072*	0.044
调整R-平方	0.316	0.286	0.254	0.208	0.054
案例数	645	647	647	647	647

* 表示统计结果在0.10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统计结果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统计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年龄也同样影响阅读习惯。因为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以及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毫无疑问,年轻人的阅读范围比老年人更广。他们阅读更多的家庭类图书和通俗小说。不过,对于阅读高雅图书和经营管理类图书而言,年龄却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到高雅图书,年龄增大,并不必然增加或减少对于欣赏高雅文化的能力。

正如我们所料,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受过更长时间教育的人,会比那些受教育年限短的人读更多种类的图书。同样,教育也是阅读品位的重要决定因素。正如其大的标准化系数所表示的那样,教育与阅读高雅图书和家庭

类图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向关联。不过，教育与阅读经营管理类图书和通俗小说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提供经营管理信息的专业化图书与阅读者的教育水平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居民识字率很高，使得大多数人可以把阅读通俗小说作为一种休闲方式。

在除了小说以外的所有阅读广度和偏好的所有指标中，上海居民的分值都比别的城市的居民低。我们的数据不足以用来检验地区差异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能假设上海居民更不喜欢阅读的原因。或许他们太忙于自己的事业、忙于赚钱、忙于看电视而无暇阅读？或许上海居民家里私人空间太小或者太挤，从而不能享受在一个安静、私密的时间来阅读一本喜欢的图书的乐趣？很显然，要揭示城市之间的差异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文学知识和品位的决定因素

就文学知识的广度而言（表6第1列），阶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党政干部、企业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才，比其他阶层的人读过更多作家的作品。办公室职员、私人企业主和个体户的表现更接近于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

而就文学品位而言，相较于劳工阶层，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更喜欢阅读当代小说和“经典小说”，但不喜欢“红色经典”以及矫揉造作的言情小说。企业经营者阅读很多当代小说，但不喜欢读其他小说。私人企业主则很特别，他们阅读大量的言情小说，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其他阶层，表现出了比较低的文化品位（第2~5列）。

正规教育年限在这里也同样有着很强的正面影响。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所涉猎过的作家数目就越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杂食者”，不仅仅喜欢读当代小说，也喜欢读“红色经典”和“经典著作”。只有文化品位比较低的言情小说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职业阶层和教育的差异产生了最为一致的影响，而性别、年龄和地域的影响则各有千秋，有时甚至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比如说，总体而言年龄对于所阅读过的作家数目没有影响，但年纪较大的受访者读了更多的“红色经典”，而年轻人读了更多的言情小说。尽管我们的数据不能使我们下一个很强的结论，我们推测：老年受访者独特的阅读习惯，可能能够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是由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以前他们小学和中学课程的特定内容所塑造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所阅读的作家总人数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但男性明显地喜欢“经典”，而女性则喜欢言情小说。

表6 作家选择的阶层和其他因素影响 (标准化回归系数)

预测元变量	总的作家数	当代作家	红色经典作家	言情小说作家	经典作家
阶层 (服务业工人 = 0)					
党政干部	0.126***	0.118***	0.071	-0.02	0.12**
企业经营者	0.094**	0.137***	0	0.01	0.077
专业技术人员	0.121**	0.112*	0.052	0.076	0.101*
办公室职员	0.051	0.052	0.002	0.076	0.038
产业工人	-0.01	-0.03	-0.03	0.011	0.02
私人企业主	0.001	-0.03	-0.03	0.114***	0.032
个体户	-0.05	-0.05	-0.04	0.009	-0.03
个人特征					
性别 (女性 = 0)	0.01	-0.02	0.028	-0.12***	0.064*
年龄	-0.02	-0.06	0.094**	-0.08*	-0.05
受教育年限	0.386***	0.328***	0.298***	0.009	0.263***
城市虚拟变量 (武汉 = 0)					
上海	-0.16***	-0.08*	-0.25***	-0.03	-0.04
天津	-0.06	-0.11**	0.053	-0	-0.09**
深圳	-0.1**	-0	-0.17***	0.05	-0.08*
调整 R-平方	0.266	0.221	0.212	0.027	0.135
案例数	660	641	641	641	641

* 表示统计结果在 0.10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统计结果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统计结果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与涉及图书种类时得到的结果类似,我们发现相较于其他三个城市的居民,上海的市民较少阅读文学作品,文学知识也相对欠缺。不过,(各地居民阅读)文学种类的差异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有关地域差异相当重要的判断。总体而言,上海和深圳的居民所阅读过的作家数目比较少,特别是“红色经典”就更少,但深圳居民所读过的当代小说和言情小说就不少,上海居民读过的“经典著作”和言情小说也不少。相比之下,天津居民对于当代小说和“经典著作”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喜欢。

四、小结

文化资本可以被概念化为明确的文化品位或者明确的文化储备。因此,文化不平等可以用“品位的等级秩序”或者“知识的等级秩序”(Erickson 1996,第219页)表现出来。通过分析阅读行为中所表现的社会差异,本文运用了一个多成因模型来评估中国城市里文化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在此项研究所得出的实证发现中,我

们能得出两条比较宽泛的结论：第一，正如通过变动标准化系数所揭示的，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教育是最具一致性的差分因子，强有力地驱动着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第二，在控制了教育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阶层具有明显的重要影响。

不论我们观察总体的阅读习惯，还是了解具体阅读的作品，精英阶层和劳工阶层之间的文化分野是显而易见的。总体而言，那些身居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的人，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干部，喜欢阅读智慧之作和名家之选。与此同时，他们也喜欢从更广的图书种类和更多的作家那里汲取知识营养。相比较而言，不论读什么类型的书，蓝领阶层都普遍表现不太积极。就拥有的文化资本而言，个体户在所有阶层中排名最低。这个阶层的人读书甚至比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还要少。

我们推测，经济困难、时间紧张、农民出身、在城市里属于外来移民，这些因素都使得个体户无缘书本。因为干的是个体生意，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每天都要找活干；工作时间长，而且很不规律。在我们调查期间（1998～1999年），外地人和农民工已经占了个体户的很大比例。他们往往居无定所，因而身边也往往没有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得到的书本或者是从家里其他人那里拿来的书本。

私人企业主也是一个与文化资本基本无缘的阶层。一方面，他们有着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多的经济资本。不过，与那些身为高级白领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者不同，私人企业主拥有的文化资本少得可怜。如果考虑图书阅读情况的话，他们更接近劳工阶层，而不是精英阶层。或许，这个新兴的阶层还在不断发展成型的过程中，而且要他们丢下他们的工作来拿起书本，想来是一件难事。更何况，他们还需要利用闲暇时间来培养关系网，这对他们的生意成功至关重要。这样他们就更没有时间来读书了（Wang 2000）。

对上述有关个体户和私人企业主的观察而言，一个有趣的例外出现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国文化一向是不大看得起通俗小说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发现了对几乎所有阶层而言令人吃惊的一致性：对通俗小说的喜爱超越了精英阶层和劳工阶层（个体户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是否喜欢通俗小说，主要只取决于年龄大小。我们的这一发现与其他那些有关大众消费的研究是基本一致的：年代（同一代人）比阶层更重要（Davis 2000）。

我们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总体的结论：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社会都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有着很不一样的文化消费方式。用欧美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文化资本在不同的职业阶层之间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这一点反过来又部分地限定和固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分界。由多样化的文化

知识和欣赏高雅文化产品的能力所体现的文化资本，能够带来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便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在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取得成功^①。

总之，如果不平等是一个多维的现象，那么在研究社会差异时，分析像文化资本这样的非货币资产的分布，就和分析收入和财富的分布同等重要。不过，到目前为止，中英文献中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还没有涉及文化因素。尽管我们这项探索性的研究并没有从全体城市居民中抽取代表性的样本，但我们希望，此项研究所得的发现，能够在不平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开创一条新的探寻之路。

(赵少钦 译)

^① 不过，在阶层成员的身份起作用时，阶层也并非对文化偏好发挥影响的唯一因素。文化资本分布的地区类型也同样明显。比如说，与传统的认识相反，我们发现上海居民是（四个城市的居民中）最不爱读书的。和其他城市的居民比起来，除了通俗小说，其他所有图书种类上海市民都读得很少。他们的文学知识和文学品位总体上来说也比较低。我们还不清楚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发现。我们觉得，或许可以把上海的这个特殊情况归因于文化储备在不同城市的明显差异。我们向受访者提问：过去一年一共看了多少部电影？看了多少次体育比赛？参观了多少次巡回演出？看了多少次展览？听了多少场音乐会？看了多少场戏剧？上海的受访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得分要比四个城市的平均水平高出很多。不过，除了欣赏艺术展览外，他们在读书和了解文学知识方面落后与深圳的受访者。也许存在两种类型的文化：可以展示的和不可以展示的。很可能就可以展示的范围而言，上海市民的文化修养很高；而就像读书这样不可以展示的范围而言，他们的表现则要差一些。不过上面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文学品位的差异。最后，我们假设：上海市民读书比较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现代化和商业化的文化之中。我们不能确定这样下结论是否有些过分，但所有的研究发现都似乎指向那一个方向。尽管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解释，这些数据已经清晰地表明，不论阶层、教育、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如何，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这种地区差异想来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亚文化”。因此，我们的受访者的阅读习惯所揭示的是，中国的管理、技术和创业精英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已经越来越紧密，受“同质化的”国家政策的限制也越来越少；但正如处在不同阶层一样，他们因为处于不同地域，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品位。无论如何，亚文化的重要性值得进一步探索。